

大家文丛

哲学与人生

人生要有大爱

读书本该会意

为自己找一个安身立命处

会东西之学 成一家之言

恒称其君之恶者 可谓忠臣矣

知识分子如何对待无奈

◎ 汤一介 著 ◎ 江力 选编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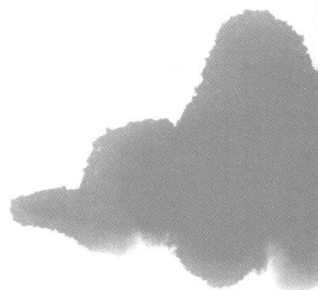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哲 学 与 人 生

汤一介 著

江 力 选编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哲学与人生 / 汤一介著; 江力选编.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7. 9

(感悟人生·大家文丛 / 梁刚建, 江力主编)

ISBN 978-7-5043-5295-8

I. 哲... II. ①汤... ②江...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6504 号

哲学与人生

作 者	汤一介
选 编	江 力
责任编辑	沈楚瑾
封面设计	郭运娟
插 图	郭运娟
版式设计	张智勇
责任校对	张 哲
监 印	陈晓华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86093580 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邮政编码 100045)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京南印刷厂
装 订	涿州市新华装订厂
开 本	710 毫米×980 毫米 1/16
字 数	280(千)字
印 张	17.75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60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043-5295-8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作者介绍

汤一介：1927年生于天津，原籍湖北黄梅。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现任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中心主任，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华孔子学会会长。1990年获加拿大麦克玛斯特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任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纽约州立大学宗教研究院研究员、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胡适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钱宾四学术讲座主讲教授。曾任美国俄勒冈大学、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国际价值与哲学研究会理事，国际中国哲学会主席（1992—1994）。著有《郭象与魏晋玄学》、《早期道教史》、《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儒道释与内在超越问题》、《在非有非无之间》、《我的哲学之路》、《非实非虚集》、《昔不至今》、《魏晋玄学论讲义》、《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汤一介卷》、《汤一介学术文化随笔》、《和而不同》、《佛教与中国文化》、《生死》、《Confucianism, Buddhism, Taoism, Christianity and Chinese Culture》、《La Mort》以及学术论文三百余篇。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著辑要丛书》七卷、《道教文化研究丛书》十二卷、《国学举要》八卷、《二十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十四卷等。



人生感悟

- 人生要有大爱 / 3
读书本该会意 / 5
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 / 8
为自己找个安身立命处 / 11
涵养须用敬 进学在致知 / 13
“会东西之学，成一家之言” / 15
“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 / 18
知识分子如何对待“无奈” / 20
“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 22
“文化热”与“国学热” / 26
现代社会中的书院 / 30
昔不至今 / 33
禅师话禅宗 / 35
在非有非无之间 / 40
不要把五四运动与“打倒孔家店”等同起来 / 44
在韩国釜山三光会上的讲话 / 46

- 给来北大历史系的小同学讲话 / 49
 世纪之交谈精神与信仰 / 53
 论老子的书和他的思想 / 60
 孔子儒家思想 / 74
 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哲学思考 / 84

散文纪事

- 读祖父雨三公文 / 99
 我的父亲汤用彤 / 104
 父亲给我的三封信 / 109
 记胡适给我父亲的一封信 / 112
 记我的母亲 / 114
 我真的能有什么信仰吗 / 117
 从《东方之子》说起 / 127
 “真人”废名 / 132
 悼念贺麟伯父 / 137
 读钱穆先生文 / 140
 悼念周一良先生 / 145
 怀念张岱年先生 / 148
 对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的理解 / 155

夫子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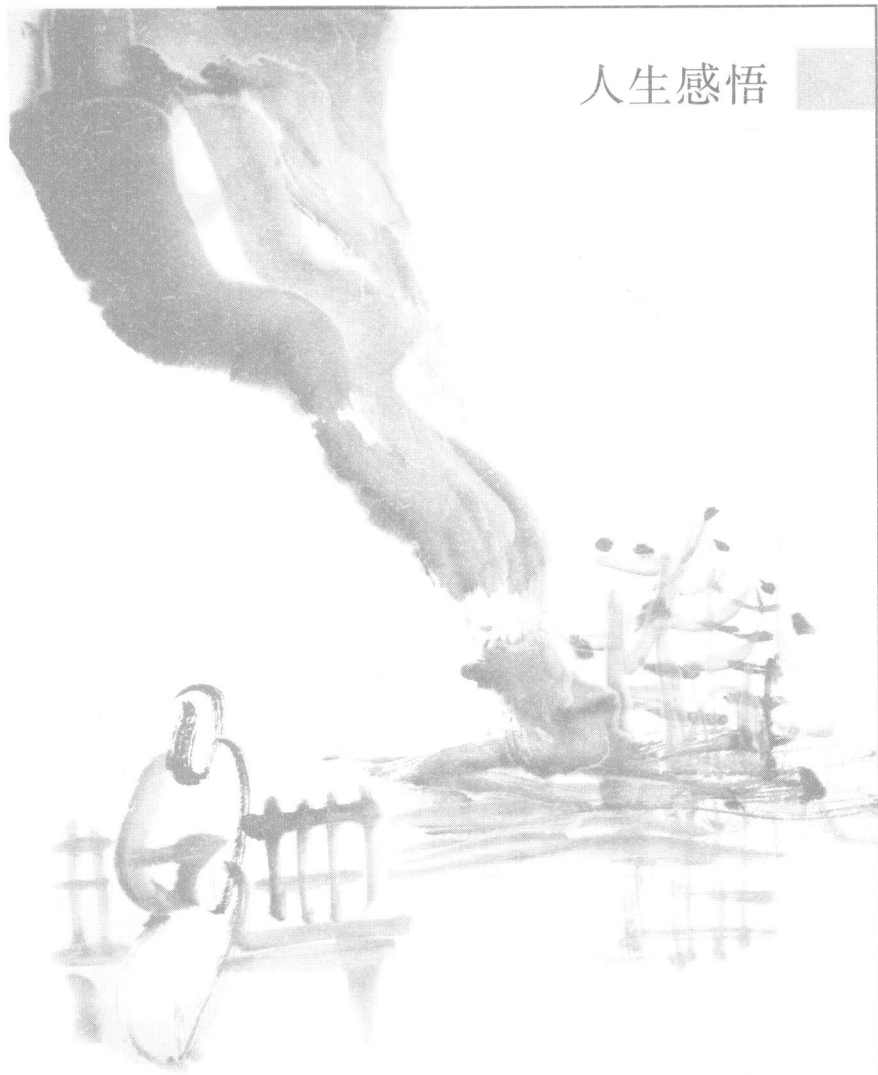
- 我的童年 / 163
 到云南 / 167
 我的中学时代 / 174
 西去延安幻想曲 / 177
 北大四院的生活 / 180
 我在沙滩和未名湖 / 185
 我与北大 / 188
 为什么不说自己是哲学家 / 191
 自由的思想最重要 / 194
 我们家的儒道互补 / 199

我的子孙成了美国人 / 202
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 / 205
我的哲学之路 / 208

文化评说

汤一介先生的中国文化与哲学之旅 景海峰 / 227
迎汤一介教授来新亚书院讲学 郑宗义 / 251
汤一介：给中华文化一个恰当的定位 夏 榆 / 256
正处于伟大复兴前夜的中华民族需要“反本开新” 王 辛 / 262

人生感悟





人生要有大爱

哲
学
与
人
生

我喜欢读书，活到七十多岁当然读了不少书，但并不是“读书”都有故事可讲。但有时读一本书会影响你一生，会是一个美丽的故事。这个故事会让你常常记起，甚至你会一次又一次地向别人讲述。一九五〇年我还是北大哲学系三年级的学生，现在是我妻子的乐黛云，是北大中文系二年级的学生，我们一起在北大青年团工作。有一天乐黛云拿了伏契克的《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给我看，她说：“这本书表现的对人类的爱深深地打动了，我想你会喜欢它。”这本书是捷克共产党员伏契克在一九四三年被希特勒杀害前在监狱中写的。这时我大概已经爱着乐黛云了，但还没有充分表露出来。当天晚上我就一口气把《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读完了。书中所表现的对人类的爱、对理想的忠诚，同样使我大为感动。我把这本书读了好几遍，其中有一段我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背出来：

我爱生活，并且为它而战斗。我爱你们，人们，当你们也以同样的爱回答我的时候，我是幸福的，当你们不了解我的时候，我是难过的。我得罪了谁，那么就请你们原谅吧！我使谁快乐过，那就请你们不要忘记吧！让我的名字在任何人心里不要唤起悲哀。这是我给你们的遗言，父亲、母亲和妹妹们；给你的遗言，我的古丝妲（引者按：古丝妲是伏契克的妻子）；给你们的

遗言，同志们，给所有我爱的人的遗言。如果眼泪能帮助你们，那么你们就放声哭吧！但不要怜惜我。我为欢乐而生，为欢乐而死，在我的坟墓上安放悲哀的安琪儿是不公正的。

我每次读到这里时，禁不住为这种热爱生活、热爱人类、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而热泪盈眶。本来在一九四九年前，我对真正的生活了解很少，虽然在我心中也有着一一种潜在的对人类的爱，但那是一种“小爱”，而不是对人类的“大爱”。我读了《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后，似乎精神境界有一个升华，可以说我有了一个信念：我应做个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人。由于是乐黛云让我读这本书的，因而加深了我对她的了解，以后我们由恋爱而结婚了。

在这几十年的生活中，在各种运动中我整过别人，别人也整过我，犯了不少错误，对这些我都自责过，反省过。但在我的内心里，那种伏契克式的热爱生活、热爱人类的情感仍然影响着我。人不应没有理想，人不能不热爱生活。

2001年1月4日





读书本该会意

哲
学
与
人
生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这是我的读书观。一个学者一生要读各种各样的书，不是读什么书都要做到甚解。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很多地方读不懂，但还爱看，因为就想知道故事的大概。长大了再读《三国演义》也还有不懂的地方，只是想知道它和《三国志》所载有些什么不同罢了。因为我并不想做研究《三国演义》的专家。后来我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再后来当了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我读书、教书，还是信守“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信条。研究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家有那么多书，每本书、每句话，都要求“甚解”，可能吗？

我认为陶渊明这两句话对研究哲学的人来说，后面一句“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更重要。我们常把汉人对经典的注释叫“章句之学”，每章每句都要详加解释，《汉书·儒林传》谓：“一经之说至百余万言”，儒师秦延君释“尧典”二字，十余万言；释“曰若稽古”四言，三万言。至魏晋风气一变，注经典多言简意赅，倡“得意忘言”，例如郭象注《庄子·逍遥游》第一句：“北冥有鱼，其名曰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曰鹏。”谓：“鹏鲲之实，吾所未详也”，并批评那种一字一句注解的章句之学为“生说”（生硬的解释），他说：“达官之士宜要其会归，而遗其所寄，不足事事曲与生说，自不害其宏旨，皆可略之。”我想，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这就是“会意”。读哲学书，重要的在“会意”，不在“曲与生说”。“会意”才能对古人的思想有个心领神会，才能有所创新。

据日人林泰辅说，《论语》的注解有三千余种，元朝的杜道坚说《道德经》的注也有三千余种。不管有多少种《论语》、《道德经》的注解，我们能说哪一种是对《论语》或《道德经》是“甚解”了呢？没有吧？！杨伯峻先生在注孔子说的“六十而耳顺”一句时说：“耳顺——这两个字很难讲，企图把它讲通的也有很多人，但都觉牵强。译者姑且作如此讲解。”我认为，杨先生的这种态度是对的，他只是“姑且”给一种解释，并没有说他的解释就是唯一正确的解释。在我的一篇文章中，为了说明我对“真、善、美”的看法，我就给孔子说的“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一个新解，认为这三句话是孔子说他自己追求“真、美、善”的过程。我真的“甚解”了孔夫子的话吗？没有，但我从孔子的话中“会意”出一种新意来，于是我便“欣然忘食”了。

读书人喜欢读书，特别是像我这样的读书人喜欢读各种各样的书，宗教的、文学的、艺术的、考古的、历史的、民俗的，甚至科学和科学史的如此等等。是不能要求都“甚解”的，知道一点就行了。它可以帮助你开阔眼界，拓宽思路。读你自己专业的书，当然要求了解得深入一些，但也只能要求“深入一些”，也不可能字字句句都有所谓“正确了解”，而“会意”则是更为重要的。哲学家要求的是“六经注我”，而非“我注六经”。“会意”实际上是加上你自己的“创造”，这样才真的把学问深入下去了。



读《读书》一九九三年十二月《说〈读书〉》一组讨论《最是文人有自由》和《最是文人不自由》的文章，不觉手痒，也想写上几句。我想先讲一个故事，这是真实的故事：大概在一九八〇年吧！有一次我去看冯友兰先生，偶尔谈到在“文化大革命”时的情形，那时我和冯先生是邻居，虽然我有时也挨批斗，冯先生挨斗的次数就比我多多了，这种隔三差五地批斗，是很不好受的。我问冯先生当时如何对待，冯先生说：“在批斗时，我心里就默念慧能的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冯先生说后，我们一起大笑。原来在挨批斗时仍然是可以有自由的。这就是说，在言行极端不自由的时候仍然可以有某种思想的自由。于是我不由得考虑到，可能对“自由”得分析一下层次。照我看，“自由”至少有三个层次：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行动自由。“思想”从原则上说是可以完全自由的，但是言论与行动的自由就不能不受到限制。因为人们想什么而不见诸于言行，对别人和社会就不会有任何影响；思想见诸于言行，它就会对别人和社会发生作用；特别是自由的言行很容易触犯权威；一旦触犯了权威，言行就会更加不自由了。那么，如果只是想想，而不言不行，最好也别记什么日记之类，那岂不就很自由了吗？这也不见得！不知何年何月，曾有人发明了一种叫做“忠诚老实运动”的办法，要你老实交代你过去的言行。后来不知何时，又进一步发明了所谓“交心”，也就

是要你把自己的“坏思想”通通交代出来，并且说只要自己坦白交代，就不予追究。这一下子搞得知识分子措手不及，老实的人信以为真，就把自己的思想全盘托了出来，这就变成了言论；不老实的或者不大老实的人就编造了一些鸡毛蒜皮、不痛不痒的假话。前者当时虽未定什么罪名，但一顿批判却是免不了的。可是这些知识分子万万没有想到，在以后的运动中这些自己交出来的“心”，就不再只是“思想”，而成了“言论”，并以此定上种种“罪名”。不过社会总是在进步的，现在大概再也没有什么“交心”之说了，而且有些知识分子总结了经验教训，也变得聪明一些，有时说点“违心”的话，大概也不见得会脸红。

那么到底“最是文人有自由”呢，还是“最是文人不自由”呢？这又使我想起另一个故事，不过这个故事大概不一定是真实的，在《庄子·山木篇》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大意是说：一棵长得奇形怪状的树，由于它不能成材，因此樵夫没有把它砍掉，它保存了下来。也就是说，如果它成材，就会被砍掉，而不能保存。另有一只不会叫的鹅，因为它不会叫，而被主人杀了请庄子师徒吃，这只鹅没有能保存下来。也就是说，如果这只鹅会叫，就不会被杀来吃，而能被保存下来。于是庄子的弟子问庄子：那棵树因为没有用，而保存下来；这只鹅因为不会叫（按：也指没有用），而不能保存自己，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庄子回答说：我们最好处于才与不才之间，才好保存自己。这个故事说明，一切事物只有相对的意义，而没有绝对的意义，都要看主客观的时间、地点、条件而定。从现在的情况看，知识分子在一定范围内是有“自由”的，我想再不会有什么“交心”运动了，因此思想可以“自由”了；你写写日记或者什么别的东西，只要不发表，不给别人看，而只是自己看看，总是可以的，这点“隐私权”也许宪法还可以保障。但是，你要说出来，就得考虑时间、地点、条件啦！在情况比较好的时候，也许你可以说点什么你真想说的话，虽然人们会说：“你说了也白说”，但你仍可以取“白说也要说”的态度而说之，当然最后也还可能是“说了也白说”。不过你总算说了，尽了一点知识分子的责任。然而在另外一种情况下，你最好还是不要说什么，要有“不动心”的本事。因此，我想知识分子是经常处于“自由”与“不自由”之间，要学会在夹缝中讨生活。

我谈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这岂不是十足的“乡愿”吗？确实如此。但我真想说的是：知识分子无论如何应保持其“思想自由”的品德，同时得努力争取“言论自由”。不管你“议政”也好，或是不议政而“为学术而学术”也好，都必须争取“言论自由”。知识分子作为一无形的无组织的

社会阶层，他的功能无非是两方面：一是用自己的知识和理想来对社会政治进行批评、议论和建议；另一是“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为科学而科学”，这都表现了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北京大学的同学常常问我：北京大学的传统是什么？我总是说：说北京大学的传统是“爱国”，是“革命”，无疑都是对的，这些传统对北大十分可贵。但这太一般化，因为在我国每个行业的传统都可以是“爱国”和“革命”。那么北京大学作为一所学校、一个学术研究机构，还有没有其特殊的可贵的传统呢？我想，如果北京大学有什么特殊的可贵的传统，那就是蔡元培先生提倡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了。没有“学术自由”就没有创造力，要么跟着外国人的屁股后边跑，要么就抱着古人那一套死不放，这有什么出息？！如果不能“兼容并包”，那么就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了，这样中国如何能从“传统”（包括新老传统）走向现代呢？所以在我看来，“最是文人有自由”或者是“最是文人不自由”都有对的一面。

